

【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 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语言安全观

宋 晖, 张文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文学院, 北京 100024)

**摘 要:**语言安全是现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备受学界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概念和领域。从对语言安全内涵的界定出发,探讨语言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的相互关系,发现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语言安全问题关涉甚广,由此对语言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等提出了解决方案。

**关键词:**语言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

**中图分类号:**D339;H0      **文章编号:**1673-5420(2018)01-0019-08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传统安全”一直是国际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与“传统安全”相对,“非传统安全”为非军事、政治和外交等新安全领域中的全球安全、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非传统安全被列为中国的国防任务。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确保国防安全”,并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了全新的概括。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为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确立了重要遵循。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瑞士日内瓦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发表主旨演讲,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提出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至此,由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组成的全领域安全观上升到关乎全人类兴衰的高度,安全问题不再只是一国一家的问题。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重要的软实力。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由语言问题带来的安全隐患也越来越多。因此,基于非传统安全视域讨论语言安全有助于扩大研究视野,看清问题,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解决之道。“语言安全”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概念和领域,目前还没有较为明确的界定。寇福明综合各界对语言安全的思考和研究,给出了语言安全的定义:“语言安

收稿日期:2017-12-25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宋 晖,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

张文璇,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语言大数据挖掘与文化价值发现”(14@ZH036)

全指一个国家使用语言文字的权利不受强权干涉和威胁,不因他国语言文字的侵扰失去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教育等领域的主导地位,不因各种内外因素的干扰而发生本质性变异(即保持纯洁性),不因语言地位、语言关系、语言观念、语言政策等因素而引发社会人群和民族间发生沟通障碍和社会矛盾,或造成社会、民族、宗教、教育和信仰等方面的冲突,以便满足国家和人民在经济、教育、科技、管理、军事和信息等领域发展的需要,维持社会文化与语言的和谐发展,保护国家、民族权力不受侵犯,捍卫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此外,语言安全还指日常生活中人们利用语言谈及有关健康、环境、人口流动、工作和出行安全等话题内容及其对个人身心健康产生的影响。”<sup>[1]</sup>

方小兵认为应该区分狭义的语言安全与广义的语言安全。狭义的语言安全指的是语言自身的安全问题,包括语言濒危问题、语言生态安全问题;广义的语言安全就是安全维度的语言问题,涉及语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和军事等领域中的安全功能。“狭义的语言安全在广义的语言安全概念中隶属‘文化安全’”<sup>[2]</sup>。

笔者认为,无论是哪个层面的界定,必须首先明确“语言安全”的内涵。语言不管是作为工具还是作为内容,都不存在安全问题,任何安全问题的底线都是生存问题,语言的生存问题,必须是由语言领域出现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后果。在关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讨论中并未明确规定“语言安全”的范围,鉴于语言本身的工具属性和信息属性,本文不区分语言安全、语言问题、语言安全问题等近似概念,并认为单一的语言安全不存在,语言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的表现形式。

## 一、语言安全与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与国家安全是伴生关系,政治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根本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稳定性直接关乎国家安全的大局,而语言问题关乎国家稳定,这是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语言问题可分为:语言间问题,即不同语言之间的问题;语言内部问题,即一种语言内部各方言之间的矛盾问题或标准语与方言之间的矛盾问题。语言问题处理不好,会成为政治问题的导火索,危及国家安全。

### (一) 语言问题与政府治理

如果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不能很好地兼顾各民族的利益,就会影响国家稳定与安全。语言问题处理不好,极有可能会导导致民族独立或国家分裂<sup>[3]</sup>。1914年,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也特别指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语言的统一和无阻碍的发展,是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周转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也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sup>[4]508</sup>。语言问题作为民族斗争的重要手段,一直以来容易被政治化。戴曼纯、朱宁燕具体区分了语言民族主义的两种类型,即整合型和分裂型,认为两者功能不一。整合型语言民族主义以统一民族语言为手段,谋求民族解放或超民族共同体的建立;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给多语言多民族国家带来政治危害,个别族群以语言为借口发动民族运动,谋求自治或独立<sup>[5]</sup>。

语言问题处理不好还会造成“内困”和“外交”的难题。2015年比利时林克比克镇竞选便引起了一场语言之争。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附近的只有5 000人的小镇林克比克,在地理和行政区划上属于弗拉芒大区,当地3/4的居民是讲法语的瓦隆人。在进行镇长和镇议会选举时,这些居民大都使用法语。荷兰语是弗拉芒大区的唯一官方语言,理论上林克比克镇只能使用荷兰语。据此,大区政府内政部长在2015年10月初拒绝任命该镇普选产生的法语镇长,而是追认荷兰语候选人为镇长。镇议员以13:2的绝对多数反对这一任命,同时集体辞去镇议员职务,致镇政府陷入瘫痪。弗拉芒大区政府也不示弱,他们拒绝在该区出现法语镇长<sup>[6]302</sup>。

多语社会中的语言矛盾很难通过限制性的行政手段简单处理,处理不好会激化矛盾,因为越是区域性问题的容易体现为加强型的语言问题。Robert Lee Nichols在探讨语言多样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时认为,在当代语言安全运动中,语言本身不仅仅被认为是政治斗争的对象,同时也作为维护地方行动和议政空间的手段<sup>[7]</sup>。我们有必要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因为语言的多样性和政治权力下放是相互加强的关系,而土著居民是实现世界语言广泛多样的主体。

由语言问题带来的“外交”问题同样不可小觑。2017年10月12日,据路透社报道,匈牙利外长就乌克兰新颁布的语言法与乌克兰外长产生了矛盾,原因是该语言法禁止乌克兰境内的中学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而乌克兰有大量的匈牙利人。为此,匈牙利外长威胁报复,声称将阻挠乌克兰加入欧盟。该语言法不仅将乌克兰与匈牙利的关系降到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最低点,同时也引发了邻国俄罗斯的抗议和罗马尼亚的不满<sup>[8]</sup>。

语言问题纷繁复杂,而多语社会、多族裔社会带来的语言问题更加繁复,不仅会造成本国内部问题,还会触及他国底线,因此政府在处理语言问题时,对任何一项措施都应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考量。

## (二) 汉语中的“普方”问题

语言问题又绝非仅仅是民族主义者斗争的工具,在一种语言内部,方言与标准语之间的矛盾往往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在我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2010年5—8月在广州发生了“粤语事件”,从此次事件的发展轨迹及最后的解决方式看,政府干预与政治考量非常重要。广州市官方一方面明确指出广州没有“推普废粤”,另一方面明确表示推广普通话与保护粤语并不矛盾,要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与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sup>[9]</sup>。王玲则认为,现今城市的语言环境正在从“单语码”过渡到“双语码”,即普通话和方言共存。而类似“粤语事件”的出现,并不仅仅是由于城市中不同语码的使用范围和使用地位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也是人们为方言争夺使用空间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方言区人们的排外情绪。方言区的本地人捍卫自己所使用的方言,实际上是借捍卫语言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权益。有关部门应该从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并制定适合当地方言区情况的法律法规。同时,也要避免狭隘的地区主义者抱着地域歧视的心态,假借保护方言之名抵制外来群体的行为,有关部门应加大对理性保护方言的宣传力度,避免地区过激行为的发生<sup>[10]</sup>。

对待类似问题,我们要有忧患意识,但也不必惊慌失措,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矛盾是“语言内部矛盾”,两者是可以调和的。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交际障碍,方便国民的沟通和交流,

并非歧视、也绝非禁止方言。方言是客观的存在,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使用价值是被广泛认可的,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将长期存在。普通话在全国通用,对外代表“中国形象”。二者在各自的使用空间发挥作用,满足不同层面的需求。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强调,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 二、语言安全与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安全,语言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语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持续占据一定比重后,语言产业的发展会对国计民生产生重大影响;二是语言问题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或者经济损失。

### (一) 语言产业与经济利益

近年来,语言的资源属性日益凸显,语言和经济的联系变得异常紧密,并催生了语言经济学或称经济语言学这门交叉学科,语言产业和语言红利等问题也成为了研究热点。据苏剑推算,2010年仅国内语言培训产业的市场总值就占到了GDP的0.08%,年增长率高达25%<sup>[11]</sup>。《2016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创造的产值约为2822亿元。实际上,随着国际交往范围的日益扩大,跨国公司职员的语言使用情况可能直接影响到职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甚至影响到个人的发展,所以外语学习变得日益重要。如果说语言的工具属性偏重于语言的使用,那么语言的资源属性则使语言产生了红利,语言产业化便也顺理成章了。

### (二) 语言问题与经济损失

语言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言语交际双方可以互惠,使用不当则会带来经济风险甚至经济损失。这主要体现在与经济活动有关的语言应用领域,包括法律语言学、语言政策和语言服务等。

语言使用的不规范会传递错误信息,这类问题在法律上往往体现为“显失公平”。合同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定金”和“订金”的问题,经常使一方蒙受损失。《合同法》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而“订金”只是“订货的钱”,并不涉及双倍赔偿等问题。

语种使用不当,违反或者漠视语言法规会带来经济风险。2013年11月19日,雅加达地方法院裁定当地一份企业的英语合同文本无效。据报道,印尼一家企业与美国投资商签订的贷款协议,因未遵守印尼企业合同必须使用国语的规定,被判决不具有法律效力。此前,由于担心影响外来投资,印尼政府对只用英语或双语签署的合同文本,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判例使得美国债权人不能据此要求印尼企业偿还贷款。尽管这只是个案,但当地律师已提醒外国投资者在

签订合同时注意规避语言问题带来的风险<sup>[12]359</sup>。

语言服务涉及问题众多,但和经济损失直接关联的是翻译领域。2016年4月23日,王立非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蓝皮书》发布会上提到,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与不同语言文化的用户交流。我国一些企业由于不重视语言服务,在跨文化交流和对外贸易中,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不仅损失了国际市场份额,也损坏了企业形象和品牌。目前中国企业大都将语言服务外包,而国内语言服务机构良莠不齐,没有权威认证和客观标准,导致企业在选择语言服务供应商时带有较大的随机性,试错成本较高<sup>[13]</sup>。

语言问题势必会对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在使用语言资源的同时必须提防其可能带来的问题。在治理层面上,我们必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关注语言问题。作为企业主除了要关注自身的语言问题外,还要看到其他两个层面。

### 三、语言安全与文化安全

语言安全是文化安全的应有之义。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对文化传播、传承的意义不言而喻。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是语言多样性,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如“皮”和“毛”的关系,离开了文化的土壤,语言就成为无本之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相反,如果语言式微,文化便不会流传久远。

#### (一) 异域文化与“语言危机”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在开放中受益显著,文化在开放的过程中也实现了双向互动,既有走出去,又有请进来。2004年全球第一个孔子学院在韩国建立,“韩流”“日本动漫”“美剧”等异域文化弥漫中华大地,日常口语中中英文夹杂现象越来越多。方小兵提出,强势语言(如英语)的入侵侵蚀了汉语作为母语的安全,“各类出版物中出现了直接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现象,在汉语言中随意夹杂英语等外来语;欧化句式充斥于各类文体,严重损害了母语的标准和规范性;更严重的是,各年龄段的人都出现‘提笔忘字’的现象”<sup>[2]</sup>。为了保持汉语作为母语的纯洁性,我们必须进行语言规范化工作,包括对外来词语和字母词的规范化和汉化,加强母语习得和母语认同意识培养,从而防止人们对西方语言文化盲目崇拜现象的泛滥。章彩云也认为,针对目前存在的文字本位失落(如公共场合的标识文本不使用汉语拼音而使用英文)和西化中文(如ATM、DNA等字母词)的问题,应该加强全民的汉语文字本位意识教育,并通过立法使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和安全使用成为国家意志,同时规范公共环境中的文本,使国家意志转化为国民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sup>[14]</sup>。

对此,本文认为:第一,所谓的“语言危机”实际上是个伪命题。作为书写形式的汉字只是书面语的工具,和语言不能等同。第二,“提笔忘字”是全球性问题,英语中的提笔忘字母现象也比较突出。在英国,一个名为 Mencap 的慈善机构曾对 2 000 名成人进行了一项简单的拼写测试,测试中受试者不能求助于计算机或智能手机。测试结果是,1/3 的人不能拼写出“definitely”(肯定地)和“separate”(单独的);2/3 的人拼错了“necessary”(必需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疏于书写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们的“大脑临时性短路”造成的。第三,语言夹杂

现象只涉及语言规范,并非真正的语言安全问题,外来词的数量达到何种量级才能对一种语言产生颠覆性影响还未见定论,有学者指出,在英语中外来词甚至占到80%以上。

## (二) 主流文化与濒危语言

按照李锦芳的判断,中国的120多种语言中有近20%的语言将在未来20~50年间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语言种类将逐步减少。他认为现今造成语言濒危、消亡的原因主要包括民族杂居、通婚、使用人口、文化教育、外出务工、民族心理和语言态度6个方面。而文化教育的普及,促进了汉语的普及,以及汉-民双语现象的形成,是弱势语言走向衰微的催化剂<sup>[15]</sup>。本文认为,民族心理和语言态度与文化教育有很大关系,本质上都是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是语言濒危的深层次原因。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对本国非主流文化所在语言的影响与全球的主流文化对某国的主流文化所在语言的影响具有相似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濒危语言意味着“少数派”,为了维持文化多样性,少数民族语言保护迫在眉睫。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任何文化优势都是相对的,所以本国主流文化所在的语言也涉及保护问题。刘跃进特别指出:“作为国家文化安全之基本内容的语言文字安全,最基本的含义首先是指一个国家使用自己固有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其次是指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本身不因他国语言文字的影响或侵入而失去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第三是指语言文字在内外各种文化和非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保持合理的纯洁性;第四是指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发展能够安全稳步进行,而不至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于便利的不便、多于益处的害处。”<sup>[16]</sup>2015年5月19日,在俄罗斯族际关系和俄语理事会的联合会议上,普京总统指出,当前俄语的总体状况出现了问题。普京对网络和电视媒体上的俄语失范和过度借用外来词现象提出了批评<sup>[7]</sup>。

语言安全和文化安全息息相关,语言管理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内外兼顾,一方面要重视本国的民族语言保护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本国主流文化所在的语言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发展等问题。

## 四、语言安全与信息安全

语言安全是信息安全的逻辑前提。信息安全主要包括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语言处理的安全。一个国家处理自然语言的能力被视为语言安全的重要保障,通常可以把这种能力简单分成国家内部语言(方言)处理能力和外部语言处理能力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涉及处理的语种规模与语种结构。中国境内的语言数量,学界通常认为可以达到129种。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语委2015年5月14日的文件,由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主管,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负责管理实施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记录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实态语料,通过科学整理和加工,建成大规模、可持续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语保工程的实施将极大地提高我国内部语言(方言)处理的水平,目前还未曾见到其他国家开展如此大规模的语言保护工程。

在外语处理能力方面,我国可以处理的语言数量应在80个左右。相比美国,我们处理语言

的能力在语种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李宇明认为,美国具有处理 500 个语种的能力,可以为公民开设 200 种语言课程<sup>[17]</sup>。布什总统在任时曾为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实施了“关键语言项目”,这些关键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日语、俄语、印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美国的目标就是让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戴曼纯曾提到,美国教育部于 1985 年颁布了 169 种关键语言的目录,并在高校开设非通用语种教学。当下,美国已经从“教科书”式的语种人才培养模式转到机器翻译领域,这样可以更“多”“快”“准”地处理语言,尤其是针对那些使用人口少,地域分布稀疏的所谓“小语种”<sup>[18]</sup>。据《巴尔的摩太阳报》2017 年 10 月 11 日报道,美国将发展冷门语种的机器翻译技术。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研团队拨款 1 070 万美元,用以发展冷门语言的机器翻译。团队负责人菲利普·何恩透露,该项目周期为 4 年。团队一共有 20 名研究人员,正在建设语料库,涉及到库尔德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高棉语、苗语、索马里语等语种,内容涵盖以上语种的书籍、推特、博客、演讲等源语语料和英语翻译语料,预计收集约 100 万词汇<sup>[19]</sup>。

当今世界,闭关锁国的思想早已被时代淘汰,但“我家大门常打开”难免会加大不稳定的风险。对内与对外语言处理必须“两条腿走路”,不可偏废,其重要性无需多言。对内语言处理不只关乎语言问题,还关乎民生等诸多方面,对外语言处理则更多地彰显了国家的综合国力。

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语言问题关涉甚广,应扩大语言安全研究的视野,跳出文化安全领域。对于政治安全,语言问题可以表现为语言间问题和语言内部问题。这要求政府在处理涉语问题时,出台任何一项措施都要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考量。处理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问题,要明确其功能,拒绝极端语言政策,努力做到普通话与方言和谐发展。对于经济安全,我们不仅要看到语言作为资源产生的语言红利,同时也要意识到语言问题会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必须提防其可能带来的问题。对于文化安全,首先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制定相关政策时做到内外兼顾,一方面要重视本国的民族语言保护,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本国主流文化所在语言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发展。潘一禾指出:“语言从来就是政治、文化斗争的有效工具,是获取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国家民族共同文化的重要内容。”<sup>[20]</sup>对于信息安全,我们要坚持对内与对外语言处理“两条腿走路”,不可偏废,做好语言保护工作的同时完善语种规模与语种结构,加强外语处理能力。

### 参考文献:

- [1] 寇福明. 语言安全界定之批判思考[J]. 外语学刊,2016(5):74-77.
- [2] 方小兵. 母语意识视域下的母语安全研究[J]. 江汉学术,2016(1):121-128.
- [3] 宋晖. 语言问题也是政治问题[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9-01(7).
- [4] 列宁.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戴曼纯,朱宁燕. 语言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以前南斯拉夫为例[J]. 欧洲研究,2011(2):115-131.
- [6]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7] NICHOLS R L. Struggling with Language[J]. Ethnicities,2006(1):27-51.

- [8] 恒姗姗. 匈牙利:对乌克兰基辅新制定的语言法不满[J]. 世界语言战略资讯,2017(11):10.
- [9] 屈哨兵. 广州“撑粤语”事件引发的思考[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54-62.
- [10] 王玲. 城市语言环境的变化与语言安全——以广州“粤语事件”为例[J].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5(1):30-36.
- [11] 苏剑. 语言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定量估算[J]. 社会科学家,2014(4):57-60.
- [12]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4)[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13] 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面临三大问题[EB/OL]. [2017-11-23]. [http://www.xinhuanet.com/2016-04/23/c\\_1118715701.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6-04/23/c_1118715701.htm).
- [14] 章彩云. 国家“文化安全”意识下的公共环境语言文字现状思考[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31-34.
- [15] 李锦芳. 中国濒危语言研究及保护策略[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113-119.
- [16] 刘跃进. 解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J]. 北方论丛,2004(5):89.
- [17] 李宇明. 国家的语言能力问题[J]. 海外华文教育动态,2013(3):145-147.
- [18] 戴曼纯. 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J]. 语言文字应用,2011(4):123-131.
- [19] 于涵. 美国将发展冷门语种的机器翻译技术[J]. 世界语言战略资讯,2017(11):13.
- [20] 潘一禾. 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13-20.

(责任编辑:张秀宁)

## Linguistic secur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ONG Hui,ZHANG Wenx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24,China)

**Abstract:** Language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ield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t is also a new concept and field of research in academia.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language secur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security and political security, economic security, cultural security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language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On this basis, various solution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language security in various fields have been proposed.

**Key words:** language security; political security; economic security; cultural security; information security